

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薛凤旋 杨春

【提要】作者选取珠江三角洲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分析该地区外资发展的特征、外资对城市化的作用以及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特征,探求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外部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城市化;特征;外资;珠江三角洲

一、引言

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发展中国家对待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态度由70年代的“不友好”转为“欢迎”和“鼓励”,纷纷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收外资;二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企业投资行为的转变:为了避开工资和地价的上涨,逃避本地的高税率和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保持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也为了就近市场,这些国家的企业纷纷转向拥有廉价劳力和土地,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并且市场庞大的发展中国家。

基于上述变化,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研究模式和理论体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跨国资本流动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是一个密切相关的空间过程。传统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理论、“极化和涓流”(Polatization and trickling down)理论认为城市化是国家或区域内部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然而,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气候下,外国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空间经济和城市化的程度、格局和过程产生了一些深远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内部动力的分析已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对跨国资本的研究多是分析它们的部门和地区构成,侧重于纯经济分析,很少将

其与其它城市化动力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探究其对城市化的空间影响。

我们选取珠江三角洲^①(以下简称“珠三角”)这个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龙头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这地区在过去15年来,是在第三世界中引进外资最多,而且外资又集中在劳动较密集,出口倾向较大的行业,使其对该地区的经济、就业和空间变化的影响亦非常明显。它是中国改革开始后引进外资最早、数量最多和最成功的地区之一,它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楷模之一,而且,这个地区的有关资料亦比较齐备,为研究提供了足够的素材。这项研究对于中国其它地区乃至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和示范意义,对于“全球化”形势下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理论和研究也是一个检验和补充。

二、珠江三角洲外资发展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投资在珠三角不仅经历了从少到多的数量变化,在投资规模、层次和领域等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开放之初的1980年珠三角利用外资仅1亿美元,到1993年已达到64亿多美元,人均利用外资290美元,大大高于全国的31美元,成为全国人均利用外资最多的地区。15年来外资的投入占珠三角全社会总投资的30%以上,年平均增长率达35.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十个百分点。从1980年到1993年珠三角累积实际利用外资额达200亿美元,分别占广东省和全国累积值的68%和17%(表1)。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珠三角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1979年至1984年为起步阶段。当时有关外

表1 1980年至1993年间珠江三角洲实际利用外资额(亿美元)

年份	全国	广东	占全国比重(%)	珠三角	占广东比重(%)	占全国比重(%)
1980	—	2.1	—	1.0	47.2	—
1981	—	2.9	—	1.7	57.6	—
1982	124.6*	2.8	—	2.2	76.2	—
1983	19.8	4.1	20.6	2.7	65.4	13.4
1984	27.1	6.4	23.8	6.2	95.8	22.8
1985	46.5	9.2	19.8	7.5	81.2	16.1
1986	72.6	14.3	19.7	9.5	66.6	13.1
1987	84.5	12.2	14.4	8.2	67.5	9.7
1988	102.3	24.4	23.9	13.9	57.0	13.6
1989	100.6	23.1	23.9	14.5	60.6	14.5
1990	102.9	20.2	19.7	15.8	78.1	15.4
1991	115.5	25.8	22.4	21.3	82.3	18.4
1992	192.0	48.6	25.3	32.4	66.6	16.9
1993	367.7	96.5	26.3	64.3	66.6	17.5
合计	1231.3	293.6	23.8	196.9	67.1	16.0

*1979—1982 累计

资料来源:①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期;②广东省统计年鉴,1984~1994;

③珠江三角洲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80~1991。

注①:包括广州、深圳、珠海等28个县市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

商投资的立法和政策还不完善,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进入珠三角的外国资本侧重于宾馆、旅游、娱乐场所等非生产服务设施,投资地点以广州和深圳为主。这期间,珠三角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13.6 亿美元,占同期全省的 74%。其中深圳实际利用外资达 5.4 亿美元,占整个珠三角的 40%。(2) 1985 年至 1989 年为逐步发展阶段。1986 年 10 月国务院颁布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二十二条”)进一步完善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大量中小型的香港制造业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生产或工序大规模迁入珠三角。到 80 年代末,珠三角已成为一个与香港有垂直性生产分工联系的大型出口加工基地(Sit, 1989)。这期间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累计 53.6 亿美元,是前一阶段的 4 倍,其中投资在制造业行业的外资占了 77%。(3) 1990 年至今为高速发展阶段。1992 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广东要在 20 年内赶超亚洲“四小龙”,使投资项目与金额迅速增加。1990 年至 1993 年 4 年间实际利用外资达 133.7 亿美元,是前 10 年总和的 2.1 倍。在利用外资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投资领域也拓宽到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金融、零售业等第三产业。投资的主体趋向大型化,大中型跨国公司和集团开始成为投资主力。

这 15 年来外资在珠三角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特点,显示出主要投资来源和香港的主导性空间引力,这和现存的理论相符;但同时,它亦表现出一种对小城镇的偏向,这或许于当地投资政策的宽松以及投入成本的地域不同有关。

1. “区域边境导向效应” (Border Orientation)

正如阿格蒙 (Agmon) 和金德伯格 (Kindleberger, 1977) 指出的,沿边境临界效果在外国投资中是很明显的。1980 年到 1993 年,来自港澳的投资占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73.9%,如果加上台湾,则超过 76%,而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则分别只占 11.6% 和 3.4%。可见香港是珠三角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同时,来自港澳的投资又集中分布在环

表 2: 1980 年至 1993 年间珠江三角洲实际利用外资分布 (按城市规模), 单位: (万美元)

	1980	比重 (%)	1993	比重 (%)	累计值 (1980—1993)	比重 (%)	年递增率 (%)
特大城市	2834	28.1	84755	13.2	293698	14.2	29.9
大城市	2657	26.3	143217	22.3	591929	29.5	35.8
中等城市	2222	22.0	116262	18.0	426625	21.2	35.6
小城市及县	2367	23.6	298540	46.5	697150	34.7	45.1
合计	10121	100.0	642774	100.0	2009402	100.0	37.6

资料来源: 据广东区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 (1980~1993) 整理

珠江口沿岸的市、县,也就是最靠近香港和澳门的沿陆路或水路边境的市县。确切地说,外资在珠三角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倒“U”字形地带,它东起与香港交界的珠江口东岸,向北经深圳、宝安、惠阳、惠州、东莞、广州和番禺,接着向西南到佛山、南海、顺德、江门、新会、中山止于与澳门交界的珠海。这个倒“U”形地带恰好是珠三角的核心地区,它在 1993 年占有珠三角 76.8% 的国民生产总值、53.6% 的人口和 27.5% 的土地面积。在开放初期的 1980 年,这个地带实际利用外资占整个珠三角的 96.3%,到 1993 年仍占有 82.8% 的绝对比重。接近香港是这一地带最明显的优势,尤其是深圳和东莞,二者都离香港不到 100 公里。1993 年这两市实际利用外资共计 22.3 亿美元,占珠三角的 35.6%。根据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1992 年止分别有 47.7% 和 20.3% 的香港制造业投资在深圳和东莞。而珠三角的外资企业中,分别有 37.8% 和 14.9% 座落在深圳和东莞。

这一边境导向效应在其他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很普遍,如美国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地区及和墨西哥交界地区的投资;比利时、瑞士、德国等西欧国家在与其边境接壤地区投资 (Blackbourn, 1982)。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表明,96.7% 的已在珠三角投资的企业家把地理上的接近作为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有 12.5% 的企业家把熟悉珠三角环境作为主要考虑的因素。除空间距离之外,实际上还有“同乡”或亲友的血缘及故里关系,这是因为 90% 的香港居民与广东尤其是珠三角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同时二地都通行同一种方言 (广东话)。

2. 小城镇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珠三角的

分布逐渐由大城市向小城市和镇扩散。1980 年至 1993 年间,小城市和县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 69.7 亿美元,占整个珠三角的 34.7%;而同期特大城市广州累计利用外资 29.4 亿美元,仅占珠三角 14.2%。大城市深圳和中等城市 (珠海、佛山、江门、惠州、肇庆) 分别占珠三角的 29.5% 和 21.2%。同时小城镇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最快,1980 年至 1993 年年递增率达 45.1%;特大城市广州增长最慢,年递增率仅 29.9%;而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实际利用外资的年递增率分别为 35.8% 和 35.6%。结果,小城市和镇实际利用外资占珠三角的份额由 1980 年的 23.6% 上升到 1993 年的 46.5%,而特大城市广州的份额则由 28.1% 下降到 13.2%。同期,大城市的份额由 26.3% 下降到 22.3%,中等城市利用外资的份额则由 22.0% 下降到 18.1% (表 2)。

珠三角利用外资的小城镇倾向特征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大城市倾向” (Metropolitan-bias) 相反的。如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无论在企业个数、雇佣人数和投资金额方面都是集中于大都市地区。泰国和马来西亚大都市所吸收的外资占全国外资的比重分别高达 99% 和 62%。在企业数和职工人数方面,两国的都市区所占的比例则分别为 99% 和 30% (Fuchs and Pernia, 1987: 97)。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外资在珠三角的分布由大城市向小城镇趋向是与城市首位度的下降相一致的。在具有东南亚最高城市首位度的泰国,首都曼谷几乎集中了全国的所有日本投资,而在首位度相对较低的马来西亚和台湾,大城市吸收日本投资的集中程度相对较低,有相当部份的投资

(企业和职工人数计)分散在地区性中心(Fuchs and Pernia, 1987)。我们的研究发现,珠三角的城市首位度由1980年的10.98降为1993年的4.25,珠三角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则由47.6%降到33.6%。广州的投资环境与小城镇相比缺乏吸引力,是其利用外资竞争力不如小城镇的主要原因。珠三角的小城镇提供了更低廉的土地和劳力及更灵活的优惠措施,他们的工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选择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而在劳工雇用和待遇方法亦没有象大型国有企业的受国家的管制和约束,因而比通过中央计划来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广州更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和外商的投资兴趣。

3. “前店后厂”模式及其深化

香港制造业企业在珠三角的投资似乎比其它国家的投资更为成功,除了他们具有明显的地理和人文优势之外,还因为香港投资企业规模小,运作灵活,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投资于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与中国吸收外资的出口优先政策相吻合。

通常美国、日本和欧洲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是以获取丰富原材料和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为目标,大多是由来自于其国内市场被垄断的大型跨国公司从事进口替代和高技术行业,属于“进攻型投资”。而大部分香港企业到珠三角投资的目的却是最大限度地通过利用珠三角低廉的劳力和资源去获得迅速反馈的利益,属于“防御型投资”。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表明,到珠三角投资的企业家中仅有1.5%将12亿中国人这个巨大市场潜力列为投资决策的因素之一。他们的目标更多地是“贸易创造型”,即从事生产适合香港和其它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导向型产品。由于香港的投资浪潮,从1985开始,中国大陆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进口地区和转口市场及第二大出口地区。到1992年底,香港对大陆的出口额中,52.4%的与在中国大陆进行对外加工有关,这部分贸易额分别占由中国转口和转口到中国的贸易额的78.3%和46.2%,分别占由中国进口和对中国出口额的72.1%和74.3

% (香港统计年鉴,1993)。

过去20年间,香港经济经历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从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转向更复杂的以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同时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这个过程与珠三角的开放与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是香港工业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目前已有超过75%的香港制造业产品在珠三角生产,九成的玩具和钟表厂、八至九成的塑胶厂、八成半的电子厂都在内地设厂。珠三角地方政府为吸改外资创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生产条件,一是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通讯和土地、厂房等;二是服务配套,如财会、培训、医疗、住宿安排;三是提供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与此同时,香港企业则主要负责市场调查、出口订单、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金融决策等方面。这一被人们称为“前店后厂”的模式,对现存的边境导向效应作一深化的发展。作为主要的外资来源,香港对珠三角的外资的空间分布不但有重大影响,而且因为这些投资为出口主导型,使得香港能够保存和发展了这些投资活动所引发的较高级的第三产业活动。

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一方面是珠三角的“后厂”功能进一步向内扩展,例如深圳已将多条生产线转移出特区,据报道有90多家工厂在1992后迁出了深圳特区;另一方面是香港一些第三产业中不用和顾客见面的“后店”功能也在向珠三角渗透,珠三角作为这些新的“后店”的功能日趋增强。如汇丰银行将部分资料处理后勤服务工作迁往广州,香港国泰航空公同也于1993年将其信息处理中心迁至广州,并在当地聘请了250名员工,为香港总部提供后勤服务(南方日报,1995年4月22日);种种迹象表明,随着香港第三产业后勤机构的北移,在下一步发展中,“前店”功能也可逐渐实现在珠三角的“本地化”。这样,珠三角与世界经济和市场体系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三、珠江三角洲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特征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地处边防前

线,国家在珠三角投资甚微,加上实行自给自足、闭关自守政策,几乎没有有什么外国投资,珠三角经济和城镇也发展缓慢。除广州早已是超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外,1949年到1978年30年间没有增加一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10—20万人的小城市只有佛山、江门、肇庆。集镇建设更是萎缩,1978年仅有32座建制镇。

1978年后,农村改革使农业长足发展,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崛起、外资的涌入,人口迁移政策和土地使用、土地市场的改革,以及依据经济发展而作出的各种对城镇、城市建制标准的调整和行政体制的改革,使得珠三角城市迅速发展。城市非农业人口由1980年的481.4万人增加到1993年的903.7万人,年递增率5.0%,高于全国同期水平(3.5%)。城市化水平相应由1980年27.4%上升到1993年42.2%,比全省高出14%,比全国高出22%。我们在以下的分析,特别是有关人口迁移和就业变化以及土地利用的变化的各个方面,印证了在上述各个城市化因素中,外资的投入是起主导作用的。

1. 小城镇和小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

从1980年到1993年,珠三角的城市数目由7个增加到22个(1994年更增到26个);建制镇由32个增加到392个,其中常住人口超过1万人的48个,人口万人以下的344个。城镇密度超过100个/万平方公里,平均不到70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城镇。

从1980年到1993年13年间,特大城市保持一个;大城市则实现“零”的突破——深圳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发展成为珠三角唯一的大城市;中等城市由1个增到1990年的2个和1993年的5个,小城市则由1980年的5个增加到1990年的6个和1993年的15个,1994年增到19个。

小城市无论是个数还是人口数都是增长最快的,其非农业人口年递增率达16.7%,中等城市其次,年递增15.6%,最慢的是特大城市,年递增仅2.2%。同时,特大城市广州

表3 1980年至199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变化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3	年递增率(%)
特大城市	个数	1	1	1	1	
	非农业人口(万人)	228.9	257.0	291.4	303.7	2.2
	占全部城市非农业人口(%)	78.4	72.9	62.0	37.2	
大城市	个数	0	0	1	1	
	非农业人口(万人)	0	0	35.1	64.1	
	占全部城市非农业人口(%)	0	0	7.5	7.8	
中等城市	个数	1	0	2	5	
	非农业人口(万人)	20.3	24.5	53.4	133.7	15.6
	占全部城市非农业人口(%)	7.0	7.0	11.4	16.3	
小城市	个数	5	6	6	15	
	非农业人口(万人)	42.6	70.9	90.4	316.4	16.7
	占全部城市非农业人口(%)	14.6	20.1	19.2	38.7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1984~1994)整理而成。

的非农业人口占整个珠三角城市体系非农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78.4%下降到1993年的37.2%,大城市深圳的比重则由0上升到7.8%。中等城市的非农业人口由1980年的20.3万人增加到1993年的133.7万人,其占整个城市体系的份额相应由7.0%提高到16.3%。小城市非农业人口则由1980年的42.6万人上升到1993年的316.4万人,其占整个城市体系非农人口的比重则由14.6%上升到38.7%(表3)。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城市化的发展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个高潮是80年代中期以小城镇尤其是建制镇的迅速增长为主要特征。1984年建镇标准的调整使许多集镇改为建制镇,城镇个数从1983年的38个一跃为1984年的157个,增长了3倍多,形成城镇数目的第一次跃增。1985年下半年开始的“撤乡(区)建镇”的实施,形成了第二次跃增,城镇个数增加到280个,1986年增到344个。两次跃增使珠三角城镇数在短短的几年间增长了8倍,年递增率达108.4%。小城镇总人口增长了3.6倍,递增率达93.1%;非农业人口增长了1.5倍,年递增达35.8%。

珠三角城市化的第二个高潮则是以1992年后大量的小城市,尤其是县级市的涌现为标志。1991年珠三角还没有一个县级市,小城市只有6个。1992年设立5个县级市,其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分别占珠三角的23.0%和14.2%。1993年增设7个县级市,共有12个县级市,其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分别占珠三角的36.5%和21.9%(1994年又增设4个县级市)。这些由县升级成的县级市都分布在环珠江口的核心地带,经济发展迅猛,他们的发展使珠三角的小城市数目猛增至15个(1994年达19个),城市体系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建制标准的变化是珠三角城镇个数增长的表面原因,但本质原因则在于受外资大量涌入而激起城镇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外来人口的急升,建制标

准的调整只是对这种迅速增长的认可。

2. 人口迁移构成的城市化

1978年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包括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农业经济多元化、专业化和商品化,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导致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迫切需要转向第二、三产业;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珠三角的投资建厂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据统计,1992年底广东有300万人直接受雇于港资公司。以东莞为例,1993年底“三来一补”企业职工人数为48.9万人,占全市就业总人数的53.2%;“三资”企业职工人数16.8万人,占全市就业总人数的18.3%,二者合计占71.5%。显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官方批准的正式“农转非”人口已不能满足需要,迫切需要人口迁入以适应城镇经济的发展。两方面的结合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不同形式转移到城镇务工、经商。当本地剩余劳力转化为非农业劳动力不能满足需求,而本地的高劳动报酬又对区外、省外劳动力产生较大吸引力时,便导致大批劳动力从区外、省外迁入,在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或从事农业生产,以补充当地农业劳力之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的人口迁移经历了两个明显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中期的“自理口粮”和“未

落户常住人口”进入小城镇为标志^②。空间上,这部份人居住地区发生转移;但身份上,他们没有完成完整的“农转非”过程。但随着粮食市场的开放,他们已无异于真正的“城里人”。1984年这两部分人已达30多万,占珠三角非农业人口近10%。1980—1993年间这两部分人的增长占了(常住)非农业人口增长总数的23.5%。显示出三角洲的城市化已超乎本地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事实。

第二阶段是以80年代后期迅速增加的“暂时性迁移”(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而户口没有随迁的人口迁移)为主要特征。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0年底广东省流动人口已达300万人,占全国流动人口1/6,为全国各区之冠。整个珠三角的流动人口由1982年的11.4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279.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由0.6%上升到13.4%。在某些市县,流动人口已超过当地常住人口,如宝安和深圳,1990年底流动人口分别是常住人口的2.6倍和1.2倍。流动人口中分别有73.5%和17.4%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这部分人实际上已发生了行业和地域上的迁移,已构成了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官方城镇人口中他们未被计入。

我们用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与1990普查资料进行对比分析^③,1985年中至1990年中的暂时性

注②1984年国务院正式通告允许农民进入县级以下的集镇从事工、商业活动,以“自理口粮”——即国家不供应口粮,自行解决的方式落户。对于那部分暂时不能落户的人口,则发给“未落常住户口证”。

迁移人口达 393.2 万人, 比 1982 年至 1987 年的 1.8 万人增长了 212 倍。其中, 来自省内的迁移人口达 267.1 万人, 比 1982—1987 年间增长了 163 倍; 来自省外的迁移人口达 125.8 万人, 比 1982—1987 年间增加了 584 倍。80 年代后期, 跨省的人口迁移已大大增加, 其占总迁移人口的比重由 80 年中期的 11% 上升到后期的 29%。

迁移原因方面, 因婚姻、随迁和工作调动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是 1982—1987 年间迁入人口最主要的原因, 分别占总迁移人口的 19.6%、19.2% 和 11.6%。这三个原因在 1985—1990 年占总迁移人口的比重分别下降到 7.9%、7.3% 和 7.7%。而务工经商成为 1985—1990 年间迁移的最主要原因, 占省内迁移人口的比例由 1982—1987 年的 18.6% 上升到 1985—1990 年的 61.4%, 占跨省迁移的比重则由 24.7% 上升到 57.4%。

珠三角外资的涌入,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不但解决了当地农村剩余劳力的转化, 还吸收了大量区外、省外的自发性迁移人口, 使这部分人不但改变了职业而且离开了农村, 是“离土”又“离乡”的转变, 构成了城市化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份。

3. 土地利用与景观的变化

外资企业的建立, 促使了农村工业化和非农化的进程和城镇人口的急剧增长。加上土地使用政策的改革及土地市场的形成, 珠三角的土地利用和景观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农业用地尤其是耕地锐减, 二是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 改变了农村景观而转化为城市景观。

1980 年到 1993 年, 珠三角耕地面积由 1570 万亩减到 1070 万亩, 平均每年减少 30.8 万亩, 年递减率达到 2.2%。人均耕地面积则由 1980 年的 0.89 亩减少到 1993 年的 0.53 亩。减少量快的是 1992 年和 1993 年, 分别比上年减少 82.1 万亩和

116.8 万亩。

珠三角过去 13 年耕地减少的原因在于: 第一, 由于农业内部存在比较利益和城镇居民需求增大而导致的农业用地结构内部调整, 由传统的单一粮食生产转向渔、牧、果等副食品生产, 将耕地改为经济收入较高的鱼塘、果园、畜禽饲养场。粮食占用耕地面积由 1980 年的 77% 减少到 1993 年的 60%。第二是城镇、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迅速发展大量占用耕地。以 1993 年为例, 城镇建设、工业发展和交通用地分别占珠三角当年非农用地占用耕地总面积的 50.7%、28.9% 和 7.2%。第三是开发区和房地产建设占用大量耕地。随着土地使用权转让、出让、租赁机制的发展, 土地管理和使用权限下放, 地方政府土地开发热情高涨, 外商投资进入土地开发、房地产建设积极性不断提高。1993 年底广东全省共有 302 个开发区, 其中国家审批的 14 个, 省政府批的 31 个, 其余的 257 个都是市县一级政府审批的, 总面积达 1000 平方公里, 其中近 50% 是占用耕地的。第四是耕地丢荒严重。一是因为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于第二、三产业, 农民种田积极性下降, 农业劳动力流失而使耕地丢荒; 二是工业和城镇的发展使土壤和环境污染加重, 部分耕地因此失去农用价值而丢荒。三是土地开发后利用率低。据统计, 1992 年以来珠三角被平整的土地, 包括未完善手续征地等占用土地约 150 万亩, 其中耕地 100 万亩, 而实际利用土地不足 50% (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土规划, 1996—2010 年)。

上述四点都直接和外资大量涌入, 经济和就业转型引致大量人口和经济活动流入城镇有关, 因此, 在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 珠三角城镇建设用地不断扩大, 1992 年底全区城镇建设用地已达 6000 平方公里。从 1980 年到 1993 年间, 珠三角大部份市县的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大了 1.5 倍以上, 有的甚至更多, 如深圳扩大了 7.1 倍, 中山 4.8 倍, 南海 2.3 倍, 惠州 2.1 倍, 广州 1.8 倍。农业用地

向非农用地的转化, 充分反映了珠三角农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化, 是农村城镇化的表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城镇用地规模过大, 亦有由于不切实际的人为主观原因。近年来各市争先恐后地要建成“现代化大城市”, 随意扩大城市规划面积。据称规划到 2010 年广州建成区面积将到 555 平方公里, 番禺达 180 平方公里, 花都 120 平方公里, 东莞 250 平方公里。到那时, 珠三角全部城镇建成区面积将达 9500 平方公里, 占珠三角土地总面积的 20%。

4. 跨边境城市集聚群 (Transborder Urban Cluster) 的形成

这 10 多年来珠三角的城镇发展很明显主要集中在环珠江口一带。1993 年环珠江口的城市个数为 11 个, 占整个珠三角的一半, 城市非农业人口达 537.6 万人, 占珠三角的 72.1%。如果以从事非农业活动劳动力占农村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和非农产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 珠三角农村地区的非农化发展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包括佛山、江门、珠海、深圳和惠州市的郊区及东莞、中山、南海、顺德、番禺、新会; 第二层次是广州、肇庆的郊区及花都、三水、开平、台山、高明和鹤山, 而北部、西北部边线的农村地区则属第三层次, 包括清远市区、惠阳、惠东、博罗、增城、从化、高要、四会、广宁、恩平和斗门 (表 4)。表明城市化以及农村地区非农化的迅速发展都发生在环珠江口的沿边境的各市县。

过去 10 多年环珠江口的迅速崛起与前所述之广州, 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相对增长缓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描述为“反极化” (Polarization Reversal) (Druiven, 1993), 或“分散化的城市化” (Decentralized Urbanization) (朱云成等, 1993)。这类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广州中心地位下降与环珠江口的崛起是与香港作用的强化有关这一事实, 而并非因为广

注③二者统计口径略有不同, 1987 年 1% 抽样调查的 1982 年中至 1987 年中的迁移人口指来本市、镇、县已居住半年以上但不满五年的人。1990 年人口普查则指 1985 年中至 1990 年中离开户口登记地已一年以上的人 (包括在本地已居住一年以上和不满一年的两类人)。

州作为地区首位城市因发生饱和造成拥挤的反经济效应因而推行分散式的经济政策所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领域的权力下放，横向经济联系取代纵向政策联系，特别是由于香港这一新的强大经济辐射中心的介入，使珠三角尤其是靠近香港的环珠江口各市县对广州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离心趋向，而更密切地与香港联系起来。因而珠三角的城市空间作用被认为是“双中心，双向辐射”是比较合理的（许学强，1987）。环珠江口的各市镇通过水陆交通可直接与港澳联系，发展机会较为均等，导致城镇空间分布的均衡。其他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反极化”是由于原极化中心的“不经济”导致，广州地位的下降只是广州在共同提高基础上相对比重的变化，而不是本质上的衰退。同时，小城镇和城市的迅速发展在空间上并不是在整个珠三角范围内在绝对分散化或均衡，而是相对集中在环珠江口一带，是“相对集中的分散化”（Relatively Concentrated Decentralization）。

国内亦有学者将这珠三角的城市发展描述为“城市带”的形式（Megalopolis）（郑天祥，1991）或由“农工混合过程”（Desakota）和核心城市及其外围区构成的“超级城市区”（Mega-urban region）（许学强等，1994）或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姚士谋，1992），虽然提法各异，但他们都过分强调珠三角与港澳的结合，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珠三角与港澳之间，尤其是香港两地之间的边界（border）的存在，而且至少在1997年后的50年仍将存在。这一特点与Megalopolis之起始含义不同。Megalopolis是建立在同一社会制度（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内各城市发展水平较为一致的基础上，是人口、经济活动向大城市集中的结果，并以大规模城市发展为主要特征。而过去10多年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发展是以小城镇、小城市为主导的，以农村剩余劳力不大规模迁向大城市为特征的。而港澳与三角洲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分隔亦使他们仅在经济上和一些文化特征上和这些三角洲城市连在一起。它们的结合是有限

表4：珠三角农村非农化，1993

非农产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	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比重(%)							
	>80	70-80	60-70	50-60	40-50	30-40	20-30	10-20
>90	I							
89-90	佛山	江门	珠海	番禺	II			
			深圳	新会	花都	开平		
			东莞		三水			
			中山				III	
70-80			南海	惠州	肇庆	广州	台山	增城
			顺德			高明	鹤山	
60-70					惠阳	惠东	博罗	从化
					恩平			
					高要			
					四会			
50-60					广宁	斗门		
					清远			

度的，不全面的，因而在质及量方面都有别于西方的“城市带”或“超级都市区”。仅由珠江三角洲人口规模和城镇密度达到Megalopolis之特征判断珠三角符合Megalopolis，未免太过简单化。

我们上述的研究也表明，珠三角在很多方面比“农工混合过程”（Desakota）已有所不同而又更进一步。麦吉（McGee）将“农工混合过程”定义为在第三世界中同一地区内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行为（McGee，1991），这种地区的出现，使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变得不太明显。虽然珠三角农村城市化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与此特征相一致，如历史上是以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粮食高产区、非农活动的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土地利用的混杂、行政管理上的“灰色地带”性等（McGee，1991：17），但珠三角城市发展的特点表明这一地区与此至少在以下几方面不同：（1）非农活动的增长已经超越了仅“同一家庭内各成员的劳动分工为主”，本地原有农业人口已有70%以上已稳定、彻底地转向非农产业。（2）珠三角的人口流动并不仅仅局限于“区内小城镇往大城市的通勤和区内的密切的人流和物流”。80年代中后期以来来自区外和省外的流动人口已不断增加。物流方面，外资

大量涌入造就的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决定了它必然是区内、区外“大进大出”。（3）珠三角的城市化的条件并非如麦吉指出的那样，要“靠大城市，如广州为农村季节性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农副产品市场”，更主要的是迁往小城镇或甚至在农村地区从事非农业活动，从而使农村地区迅速城镇化。1992年后大批县升级为县级市便是对此的一个承认。

珠三角过去10多年来利用外资的边境效应与城市化发展的沿边境效应的惊人相似，反映出珠三角通过香港这一世界城市（World City）正逐渐渗入世界城市体系，纳入世界经济轨道。一个“跨边境的珠三角—香港、澳门城市聚集群”（Transborder Urban Cluster）正在形成。如果说世界城市是20世纪后期世界政经全球化的结果，那么跨边境城市区则是这一大现象中的一个衍生物（Herzog，1991）。这种结合，无疑将为1997年后香港与中国实施“一国两制”体制提供良好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这个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在Megalopolis和desakota之外又加添了一种新的形态，即在外资导向下的原人口密集农业地区在新的以出口工业为主的经济带动下的新的城市化模式。

四、结论

传统的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化是国家或区域内历史、社会和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大多不考虑外部因素,如外国资本流动的影响。70年代以来的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对此提出了挑战,然而拉美国家对外国资本和贸易的依赖却导致了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低度工业化”甚至“过分城市化”。同其它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相似,珠三角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的经历却展现出另一幅景象: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不同于外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集中在已开发的大城市地区,外资在珠三角却显示出“小城镇”倾向;与

之相一致的是以小城市、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外资的涌入,在小城镇甚至农村城区兴建外资企业,不但吸收了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为大量来自区外、省外的迁移人口创造了就业机会。外资的涌入,不但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而且也使农村景观迅速向城市景观转变,从而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使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及其深化,创造了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世界市场体系结合起来的先例。外资在珠三角的沿边境导向效应改变了珠三角城市发展的格局,构成了“珠三角—港澳跨境城市聚集群”的基础和条件,从而通过香港这

个世界城市,使珠三角城镇纳入世界城市体系的范畴。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利用外资及其引导下的城市化的发展丰富了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动力因素和格局的认识。虽然珠三角有其独特性,如与其主要投资来源地香港有密切的地理、人文联系,但在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联系,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不能独立存在是无疑的。因而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分析,而必须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 Agmon, T. and Kindeberger, C. P. eds. *Multinationals from Small Countries*.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77.
2. Blackbourn, A. *The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o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 Review, in Taylor, M. and Thrift, N. eds. *The Geography of Multinationals*. London: Croom Helm, 1982.
3. Drijven, P. C. J. *Trend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aubmann, W. ed. *Urban Problems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mburg, 1993.
4.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 69-73.
5. Herzog, L. A. *Cross-national Urban Structure in the Era of Global Cities: The US-Mexico Transfrontier Metropolis*. *Urban Studies*, 1991, 28 (4): 519-533.
6. Hong Kong Government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1993.
7.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Industry & Research Division. *Hong Kong's Industrial Invest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1992.
8. McGee, T. G. *The Emergence of Desakorth Regions in Asia: Expending a Hypothesis*, in Ginsburg, N. et al. eds.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1: 3-26.
9. Sit, V. F. S. *Industrial Out-processing-Hong Kong's New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ian Profile* 1989, 17 (1): 1-3.
10. Sit, V. F. S. *Transnational Capital Flows,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Urban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Kasarda, J. D. and Parnell, A. M. eds, *Third World Cit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1993.
11. Fuchs, R. J. and Pernia, E. M. *External Economic Forces and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Pacific Asia*, in Fuchs, R. J. et. al.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olicies in Pacific Asia*.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 88-111.
12. 姚士谋等. *中国的城市群*. 合肥: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2.
13. 许学强, 周春山. *论珠江三角洲大都会区的形成*. *城市问题*, 1994 (3): 3-6.
14. 郑天祥. *催育以港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的形成*. *港澳经济*, 1990 (8).
15. 许学强. *珠江三角洲市镇发展空间模式的转化*.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论丛* (2), *地理学论文集第二期*, 1987.
16. 广东省国土厅. *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土规划(1996-2010年)*, 1995.
17. 朱云城, 雷劲松. *珠江三角洲人口城市化现状与发展前景*. 见王嗣均主编. *中国城镇的区域比较研究论文集*.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2: 190-215.
18. 温琰茂, 胡国光. *珠江三角洲耕地资源与粮食生产下降的状况及分析*. *珠江三角洲经济*, 1995 (1).
19. 郑天祥等. *以德港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网络*.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1991.
20. 冯平等. *珠港澳经济一体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21. 许学强等. *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城市化*. *珠江三角洲研究丛书(四)*.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22. 王鼎昌主编. *2010年的广东—规划及战略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作者工作单位: 香港大学地理及地质学系